

## 《重视语言：公共行政学的叙述性基础》评述

王秋石\*

White, J. (1999). *Taking Language Seriously: Narrative Found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17pp.

本书的缘起是为了回应 80 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学者(如, Perry, J., Kraemer, K., Stalling, R., Ferris, J., Houston, D.)对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越来越激烈的批评。这些学者以公共行政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如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和论文摘要为依据,以主流实证社会科学标准为准绳,集中批评了如下几个问题:

1. 绝大多数研究属于理论应用,而非理论探究;
2. 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缺乏;
3. 提出问题的研究多,深入分析解决问题的研究少;
4. 能够指导研究进行的一般性理论构架缺失。

根据以上几点,他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基本上是非积累性的(noncumulative),这些研究未能为系统科学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怀特也认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普遍不高,但他却给出了完全不同于主流学派的解释:对学术研究之哲学基础的不同见解阻碍了知识的系统化,并影响到了对行政实践的改进。怀特

---

\* 王秋石,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博士学位候选人。

本书中译本即将出版。

进一步指出,广义的哲学和科学哲学理应成为任何研究的理论指导,为研究提供假设验证或逻辑推导的支持,但是目前的公共行政学者对哲学基础并未很好地理解和运用。所以,哲学基础——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才是行政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站在哲学基础的高度上,怀特对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首先,一些学术文章借用主流社会科学的逻辑(如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对人或组织行为进行解释,而这些解释性研究(explanatory research)深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传统的影响。实际的情况是,实证主义模式单一,主义逻辑机械化,它已逐渐被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所取代。相较而言,后实证主义比实证主义更适合成为公共行政学的哲学基础。其次,许多致力于定性研究的学者也同样缺乏基本哲学理论的指导。后实证主义对逻辑诉求的重构可以为诠释性(interpretative)和批判性(critical)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但在定性研究实践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实证主义多年来的传统在公共行政和政策学领域渐渐形成了机械化思维的习惯。这种思维模式尽管在某些简单而定义明确的问题上行之有效,但它却不能解决行政学中复杂而模糊的问题。再次,本领域中许多学者所受的培养偏重方法的训练,而忽视哲学基础的养成。不少人对最新的哲学发展知之甚少,许多博士培养单位也根本没有设置相关的课程。实际上,哲学重构对行政和政策制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哲学的基础上,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模式才能达到与主流的解释性研究同样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哲学重构的意义在于将以上3种研究模式统一于同一叙述基础——任何知识体系归根结蒂都是以语言为表述方式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所谓的知识了。基于以上认识,怀特全面探讨了各种哲学流派在行政学中的意义和作用,并力图将不同流派之间的纷争与隔阂统一在一个以语言和叙述(narrative)——“讲故事”为基础的一般性哲学理论框架。

怀特提出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任何研究本质上都是一个“讲故事”或者说叙述的问题,因为任何知识,包括公共行政的知识都不过

是由语言构成的某个“故事”的书面表达。语言是知识的载体和传播者,它帮助我们发展并运用知识去解释和改造世界。认同了这一点,公共行政学中的各种叙述性理论(narrative theory)便有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为了支持这一论点,怀特在书中列举了下述的理由:第一,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而同样也具有社会和文化属性,而後者的基础和表现形式就是语言,从日常生活到公共行政中复杂的人际和组织行为莫不如此。第二,对语言基础的认同还可以为3种研究模式,即主流的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提供统一的理论平台。迄今为止,公共行政学界对3种研究模式时间的相同与相异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就本质而言,每一种研究模式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的游戏”(Ludwig Wittgenstein 语),它运用这种特定的语言去发展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借以认识和改造社会。由于这些语言具有的特定性,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存在隔阂,通常无法交流,比如,主流学派和阐释学派,除非他们愿意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再者,从理性的角度来看,3种研究模式对应3种不同的理性,即解释学派对应工具理性,阐释学派对应阐释理性,批判学派对应批判理性。阐释性研究扎根于传统的哲学思想,比如语言哲学、认知论和现象学;而批判性研究着重于克服固有的对现实的误读,从而打破既有理论对知识发展的束缚。怀特特别强调指出解释性研究其实也是建立在阐释和批判理性之上的。第四,任何研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须通过实际的“对话”来检验,阐释性和批判性如此,解释性研究也是如此。所以,“实际的对话”是3种研究模式的共同检验标准。最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和实践相联系。一种知识体系,比如行政学,如何能指导我们对行政实践的改进,如何将思想、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叙述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的一章中,怀特把他的“讲故事”理论付诸实践。公共行政学和组织行为学中的行动理论一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根据 Shafritz(2004)的解释,行动理论首先确定组织发展或改进的需要,再通过外部咨询顾问来建立组织成员对本组

织问题的心理归属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最终从内部解决问题。行动理论的一般流程是这样的: 1. 通过问询或调查问卷收集组织内部的信息, 诊断问题的所在; 2. 系统地向组织成员回馈搜集到的信息; 3. 通过与组织成员的探讨, 确定上述诊断的准确性和问题的心理归属; 4. 充分利用咨询顾问的知识技能与组织成员对本组织的熟悉, 联合制定改进计划; 5. 根据需要不断重复上述各步骤。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 组织始终处于“行动”的状态下, “行动理论”因此得名。怀特身体力行, 为我们描述了他为某州政府做咨询顾问的真实经历。该州政府本希望研究结果能支持他们希望增加案例分析员的要求, 但是怀特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通过和政府工作人员细致的交流, 怀特发现该州政府实际上需要增加的是一般文秘人员。文秘人员完全可以处理好目前由案例分析员来承担的大量基础工作, 这样现有的案例分析员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做他们应该做案例分析的工作。怀特就是通过这样“讲故事”的方法来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

马骏(2004)在《美国主流公共行政学的反对派》一文中将怀特的这本著作归于强调公共行政学的认识论及知识论基础的反对派。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怀特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批判主流的实证主义。事实上, 怀特曾多次强调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实证研究的意图, 甚至他本人还曾取得过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 受过比较系统的数量研究的训练。那么, 我们如何理解书中的观点和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呢? 实证主义思想源的康德。康德否定对人类行为神学或形而上的解释, 推崇像牛顿三大定律一样严格的科学哲理。他的思想对启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并逐渐波及到心理、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 绵延至今。进一步看, 实证主义自身也并非单一的、一成不变的理论, 而是一整套关于自然、社会、文化的科学哲学体系。从本质上说, 实证主义的宗旨是要解除传统宗教和固有观念对人的思想的束缚, 通过理性的、严格的“实证”而达到“启蒙”的目的。怀特所反对的并不是实证主义的

这个启蒙宗旨本身，而是它在运用于公共行政之后所引起的种种错误观念。怀特认为，在过去的 20 年里，传统的实证主义越来越不能有效地解释知识探求的逻辑，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其他社会学科都已过渡到了后实证主义。在保留了一部分实证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后实证主义提出了自己对知识逻辑、解释逻辑和知识的有效性的独特看法。具体来说，后实证主义通常具有这些主要特征：反对既有观念，否定对整理中立冷静的观察，重视“实践对话”（practical discourse）的作用，等等。而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作为知识一般基础的语言。所以，作为应用科学的行政学更适合以后实证主义叙述性理论体系而不是实证主义僵化的工具性逻辑来发展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行政实践中去。

综合来看，怀特的这本书行文严谨，举例丰富，尤其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非常新颖独特的看法，并运用多种哲学流派的思想发展出了“讲故事”的理论体系。但是，书中的论证也给读者留下了几个比较明显的疑问。首先，书的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所有研究根本上都是一个讲故事或者说叙述的问题”（6）。虽然在随后的章节里，怀特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和支持他的这个论点，但是这样的观点还是显得太绝对化了。如果说实证主义确实已经不再适合当今行政学的发展需要了，那么后实证主义，或者是怀特所说的“讲故事”是不是惟一的替代呢？其实其他的各种理论还有很多，但是怀特的论述或多或少地给我们留下了“讲故事”是惟一选择的印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者 Rohr（2000）也认为怀特的这个论断相当武断，难以让人信服。另外，为了让“讲故事”涵盖多种哲学流派和 3 种研究模式，怀特不得不将它定义为非常宽泛的“研究的最基本的语言文字基础”。在逻辑学中，“不可能证明为伪”的命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神学将一切都归结为神的意志，反对者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无法打破神学的论证体系，因为“神”的定义是包含一切的，无所不在的。怀特对“讲故事”和叙述基础的定义就类似于这种“不可能证明为伪”的命题。再者，怀特虽然也考虑到了实践应用的

问题,并且还举例说明了如何用“讲故事”来解决行政中的实际问题,但本书给人总的印象还是反对旧理论多、建立新理论少,提出的问题多、解决的问题少。和实证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理论模式注重思想内质但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很难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也是这些理论一直不能成为“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公共行政研究经历从泰勒主义(Taylorism)、古力克(Gulick)“行政原则”,再到赫伯特·西蒙——瓦尔多的大辩论,以及后来 Minnowbrook 关于实证主义的论争。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公共行政学渐渐分裂成新公共行政学派、政策学派,以及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构架的公共行政学。实证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已经渗入到了行政学的各个领域,对政策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尤其明显。尽管实证主义的许多假设(比如利益最大化)以及二元对立观念(比如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等等)历来为许多学者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证主义不仅有强大的数学工具作为后盾,而且还有现代社会巨大的科技发展为号召,它的影响力之大、地位之稳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太可能被动摇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许多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在以数量为主导公共行政领域,比如公共财政、绩效预算、项目评估等等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比如税收、公债等仍然以非常不科学的简单估算为决策依据。以这样的现状,反对实证主义似乎还显得为时尚早。美国情况如此,中国就更是这样了。马骏(2004)在他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

这一流派的研究或许会让一些国内的研究者感到有兴趣,但是,针对国内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很多这一学派的研究并不适于大量引入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关键点,这一流派是作为主流的实证研究的反对派而存在的。而在中国,我们连一个象样的实证研究都没有。

无论如何,怀特的这本著作启发我们跳出实证主义的思维束缚,帮助我们更一般的哲学角度来思考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实践。作为

实证主义的反对派,这一流派的研究大大地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建构,而且做为反对派,它的影响并不亚于其他的公共行政学流派。美国公共行政学的渐趋分裂的现状决定了没有任何流派是处于绝对的优势,所谓的主流学派如政策学派、公共选择或新制度学派也不是由于它们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具有最大的影响,而仅仅是因为它们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传统(实证主义研究)是一致的。虽然怀特的“讲故事”理论很难用于指导实际的研究,在行政实践中也不容易被采纳,但是作为行政学的研究者,我们却不能忽视“不同声音”的存在,特别是这些声音背后深厚的哲学传统。《重视语言：公共行政学的叙述性基础》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

### 参考文献

马骏(2004). 美国主流公共行政学的反对派. 重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网:<http://hs.cqit.edu.cn/POPArticle/44/55/Html>.

Hanbury II, G. L. (2001). Review of the Book Taking Language Seriously: Narrative Found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book review).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23(4): 644 - 652.

Rohr, J. A. (2000). Taking Language Seriously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4). 937 - 938.

Shafritz, J. M. Ed. (2004). *The Dictionary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